

· 性别视角下的萧红专题研究 ·

## 论萧红《生死场》的文本双重性

舒凌鸿

(云南大学, 云南 昆明 650504)

**摘要:**女性作者叙事文本往往具有矛盾的双重属性。就中国现代女性作家而言,其身处时代急剧变迁的进程中,既被时代挟裹着前进,又在被挟裹中有了自我的觉醒,这是中国女性作家小说叙事双重性的重要体现。作为较早建立女性文学自主意识的作家萧红,其作品《生死场》的叙事双重性特征尤为突出。在《生死场》中,表面牵强的革命叙述背后,着力凸显的是女性生命的苦难。《生死场》呈现了女性与乡土的象征性和女性与动物之间的同构性。萧红一方面依附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谋求话语权威;另一方面,她又超越了这一话语,揭示了这一话语对女性命运的虚妄性。

**关键词:**萧红;《生死场》;女性;叙事文本;双重性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7)06-0046-09

### 一、引言

文学作品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在于文学文本的多义性与模糊性。从逻辑上说,任何一个文本,都可以进行多重含义的解读。但在实际的文学研究中,多重含义的解读必须是有根据的。也就是说,要对作品中各种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综合考察,并且要注意作品与语境之间的关系,才能得出一个让人信服的结论。申丹就认为将宏观考察和微观透视结合起来,才能对作品完成一种“整体细读”的考察,将文本深层的“潜文本”内容挖掘出来<sup>[1]</sup>。因此,文学研究不能仅注意文本言说了什么内容,更要注意文本的言说方式。伊格尔顿认为:“通过注意叙事中那些看起来似乎是种种回避、种种情感矛盾和种种紧张之点的地方——那些没有得以说出口的话,那些被说得异常频繁的话,语言的种种重复(doublings)

和种种滑动(slidings)……文学批评不仅可以去注意文本所说的,而且可以去注意它怎样工作。”<sup>[2]</sup>在文本当中要揭露潜在的含义,就必须特别注意叙事话语中那些看似合理实则矛盾的表述。不仅要注意叙述者说了什么,怎样说的,甚至要注意叙述者未说什么,隐瞒了什么。文学文本的多义性常常显现为浅层意义和深层意义两种类型。文学文本深层意义的发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与普通读者的阅读有很大的差异。它往往需要研究者对文本进行从故事到话语的综合考察。

对特别注重在语境中阐释女性叙事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而言,其最大的贡献在于“结合性别和语境来阐释作品中叙事形式的社会政治意义”<sup>[3]</sup>。在《虚构的权威》中,叙事学家苏珊·S.兰瑟认为,女性作者文本具有明显的双重性特

征。兰瑟运用《埃特金森的匣子》(Atkinson's Casket)一诗的内容说明了女性文本所具有的双重属性<sup>[4] (P8-12)</sup>。从这封信的表面顺序上阅读,这封信写的是一位新婚不久的女性向自己的同性好友讲述自己的幸福生活。但当从第一行起隔行跳读时,信的内容就发生了极大变化,读者看到的是这名女子在向自己的朋友表达自己在婚姻生活中的不满与愤怒。这封信实际上是在软弱无力的表面文本(surface text)中隐藏了一个属于女性群体的潜文本(subtext)。这封信表明一个女性叙述者在男性的权威目光下,依然可以向另一名女性倾诉自己的内心秘密。这封信通过不同类型的阅读者的阅读也产生了不同的阅读效果:丈夫会认为此信是在称颂自己,而同性朋友却可以读出作者的痛苦与不满,从而形成一种双重性文本。这封信虽然是虚构的,但从其产生的语境看,又具有一种特别的意义。这封信在1832年的美国费城发表,此时自由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废奴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可以将其视为女性历史的某种表征。它是女性之间进行深刻交流的真实信物,是妇女真实的生活处境与她们文本之间连接的证据。也就是说,女性文本叙述具有双重性,体现为表面内容与实际内容的矛盾,其既屈从于男权意识,又要凸显女性意识。而这封信可以解释女性文本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表面上,刻意表现女性对男权社会规则的依附,背后则是对男权社会的怨气。这样的女性书写故意以一种公认的女性立场,通过表现女性卑微无助的心理,来获得一种男性公众的认可。

中国历来是一个男权至上的传统社会,对女性的轻视与残害从未真正地从历史中淡去。在民族危亡的时代里,女性作为被奴役被无视的群体命运更为悲惨,女性不仅要服从国家、民族的“大义”,更要服从“男权”。但她们中的大多数一直处在沉默无言的状态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的小说常常被视为代表了民族、国家(抗日)的文学。在萧红《生死场》及其之后的《呼兰河传》《马伯乐》等作品中,都表现了萧红文本的开放与多元。而在民

族国家命运的记录之外,作家自觉的女性主体意识也在其作品中得到建构。萧红文本呈现出一种多元的意义叙述,她的作品呈现了女性特有的叙述意义:“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遗产开拓出富有符号性意义的女体空间和女性乡土想象书写”<sup>[5]</sup>。

萧红是一个身心俱受摧残的不幸女性,在个人生活方面,她本身就是一个将女性作为玩物的畸形社会制度下的受害者,被男性伤害的经历贯穿了她短短31载人生的始终。萧红曾这样叙述自己作为女性的一种自觉的反省:“你知道吗?我是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重的!而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sup>[6]</sup>这段文字可以看作是萧红作为女性对自身女性意识的反省。她的小说将个人化的女性命运的书写与人类悲剧命运的呈现进行有效连接,在作者关注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人性认识的宏大主题中,悄悄渗入对女性悲惨命运的关注和思考。在这里,宏大主题指的是小说呼应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而写革命文学。1930年代的中国国内阶级斗争日益激化,日本侵华脚步时刻紧逼,在这种局势下,左联成为了中国文坛上占据文艺战线的主导意识形态。正如鲁迅所说:“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sup>[7]</sup>萧红的《生死场》是其作品中革命色彩最为浓烈、最具时代性的一部作品。前部主要从女性的角度写了农民生与死的问题。鲁迅曾说:“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sup>[8]</sup>,杨义也认为萧红小说“思考着处于原始半原始状态中的农民生与死的哲理和人类的价值”,并且在小说后半部分中,呈现这种“东北特定环境中形成的民间文化景观,以及这种文化景观在日本侵略条件下所产生的反应”<sup>[9]</sup>。在《生死场》的叙述声音中,革命叙事是小说所呈现的重要内容,但小说更多的笔触是展现叙述者对农村女性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和关注,这一内涵才是萧红小说最为核心的内容。

## 二、女体和乡土的象征性

《生死场》中小说叙述者力图在表达抗日和反战的主体中,有意将女性受难命运嵌入到国家、民族兴亡的历史图景中去。因此,她力图在《生死场》中,建构农村女性悲剧命运与乡土大地命运之间的同构关系。小说一方面表现了在抗战这一中国历史的特殊时期农村实际生活以及民族国家抗战的主题;另一方面,在表现农村之苦中又集中表现了农村女性所受到的生育之苦。萧红的小说表现了女性性别意识与民族历史文化的主题,正如林幸谦所谈到的:女体是“乡土的另一层载体”<sup>[5]</sup>。

在《生死场》的前半部分,女性身体和土地形成了相互对照的象征关系。甚至在不同的两代女性之间,也构成了互相指涉的古老命运的轮回。第一章的“场”中,隐喻着大地之母与母性的整体构成。第二章“菜圃”里,则构成了“大地母土/女体象征的延伸空间”<sup>[5]</sup>。《生死场》前四个章节——“麦场”“菜圃”“屠场”“荒山”等名称就显示了这是一幅乡村的图景,而在每一场中也蕴含了被压迫的女性命运的主题。小说开头部分迷途的山羊与寻羊者老王婆所失去的青春和生命力,在第五章中再次出现。这种结构安排,隐喻了在乡土大地上,老王婆身上所体现出的一种女体受难的寓言,将女性苦难的命运与乡土命运作一种形式上的连接。

叙述者在描写人物外貌时也将女性身体与乡土进行一种对照,形成一种暗喻:“王婆穿的宽袖的短袄,走上平场。她的头发毛乱而且绞卷着,朝晨的红光照着她,她的头发恰像田上成熟的玉米缨穗,红色且蔫卷。”<sup>①</sup>在“菜圃”一部分中,写了各种果子、蔬菜,如西红柿、青萝卜等的丰收,与金枝怀孕形成一种暗喻的对照,女性的繁殖力喻示大地母亲的再生能力。17岁拥有美好青春年华的主人公金枝怀孕,也喻示了金枝注定像大地母亲一样被父权社会所耕耘的命运。在“菜圃”一节中,第一句就是:“菜圃上寂寞的大红的西红柿,红着了。”丰收的图景,在未婚先孕彷徨不安的金枝眼中,是“寂寞”的。众人都在开心地摘倭瓜,但金枝心里却十分痛苦。对植物而

言,丰收意味着喜悦。但对未婚少女而言,孕育却是可耻的。怀孕的金枝陷入更深的沉默和哀伤中,时时担心自身的命运和肚中胎儿的命运。《生死场》中,这些妊娠母体的形象,成为了作家批判传统农业男权社会的手段。在这里,萧红文本中将女性身体与乡土空间联系在一起写作方式,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道独特的风景<sup>[5]</sup>。

女性悲惨的命运代代相继。成业婶说出了自己与金枝的相同故事,她同样也是在河边钓鱼时与成业叔叔发生了关系。在过去“我欢喜给你叔叔做老婆”,但是“这时节你看,我怕男人,男人和石块一般硬,叫我不敢触—触他”。

农业社会的文化气息代代承袭,甚至成业所唱的情歌也与成业叔叔唱给婶婶的相同。代代承袭的乡土文化,从另外一个侧面表现了女性人物的哀伤与悲痛,与荒凉的乡土情境交织在一起,同时也从另一女性人物身上喻示了金枝未来命运的悲惨结局。文本中两代人共同命运的书写既呈现了农村社会真实的两性关系,也形成了女性命运与乡土命运内在的有机连接。

## 三、女性与动物的同构性

萧红小说《生死场》常常将女性与乡村动物形象并置起来。一方面,叙述者在描述女性人物外貌时喜欢用植物来比喻,而用各种动物作比喻的现象更是俯拾皆是。另一方面,小说在对有关女性命运的关键场景的描写中也有意将动物的生活场景纳入其中。

小说中叙述者在描述女性人物如麻面婆、王婆、金枝等的外貌时,常常运用乡村的动物进行比拟,以动物喻人。在小说开头对麻面婆的描写是这样的:

汗水在麻面婆的脸上,如珠如豆,渐渐浸着每个麻痕而下流。麻面婆不是一只蝴蝶,她生不出磷膀来,只有印就的麻痕。……她的眼睛好像哭过一样,揉擦出脏污可笑的圈子。若远看一点,那正合乎戏台上的丑角;眼睛大得那样可怕,比起牛的眼睛来更大,而且脸上也有不定的花纹。

头发飘了满脸,那样,麻面婆是一只母熊了!母熊带着草类进洞。

让麻面婆说话,就像让猪说话一样,也许她的喉咙组织法和猪相同,她总是发着猪声。

对于老王婆,邻居的孩子说她是一只“猫头鹰”,“在星光下,她的脸纹绿了些,眼睛发青,她的眼睛是大的圆形。有时她讲到兴奋的话句,发出嘎而没有曲折的直声。对生活失去希望和信心的老王婆在院中睡觉被蚊虫迷绕着,正像蚂蚁群拖着已腐的苍蝇。她是再也没有心情了吧!再也没有心情生活!”

对于金枝,作者的描述则是:“金枝好像患了传染病的小鸡一般,眯着眼睛蹲在柿秧下,她什么也没有理会,她逃出了眼前的世界。”担心自己命运,担心肚中胎儿像怪物似的金枝静静地呆着:“她被恐怖把握了。奇怪的,两个蝴蝶叠落着贴落在她的膝头。金枝看着这邪恶的一对虫子而不去拂去它。金枝仿佛是米田上的稻草人。”同情金枝命运的成业婶婶是“好像小鼠一般又抬起头来”。

小说中涉及到女性人物形象的描述,作者几乎都用了动物作比喻:麻面婆像“猪”“羊”“狗”“熊”,老王婆像“猫头鹰”,金枝像“患了传染病的小鸡”“米田上的稻草人”,瘫痪在床被丈夫虐待的月英则“像一只患病的猫儿,孤独而无望”。小说也将人物外貌描写放置在女性人物的劳动场景中进行,在人物遇到困难或异常痛苦的时刻也对人物心理活动进行了动物性的比拟。全书没有用动物性词汇来描写男性人物,只将其用在了女性人物身上,无论是女性的外貌,还是女性的心理活动。

另外,在小说结构安排上,女性人物的悲惨命运开始之时,总会有叙述者对动物生活的一段描写,将读者思维引向动物与女性之间密切关系的想象中。如在小说第六部分“刑罚的日子”中,描写女性生育的痛苦场景时,一开始就写了动物的生产:

房后草堆上,狗在那里生产。大狗四肢在颤动,全身抖擞着。经过一个长

时间,小狗生出来了。

暖和的季节,全村忙着生产。大猪带着成群的小猪喳喳地跑过,也有的母猪肚子那样大,走路时快要接触着地面,它多数的乳房有什么在充实起来。

接着小说就对应地写了五姑姑姐姐和金枝刑罚一般的生产过程。在这些描述中,女性的命运是艰辛、痛苦和无奈的,作者怀着无比的同情来描写这些内容,但这种同情是通过将女性比拟为动物的方式体现出来的。人也是一种动物,也与动物有着许多相似之处,用动物拟人并不奇怪。但像萧红这样,大规模地使用动物来描写女性却是比较少的,吊诡的是,她对男性的描写却不涉及动物。实际上,这些动物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是低于人类的。从女性文本双重性意蕴的角度看,女性与比人类低一等的动物,特别是畜牲(萧红是吝啬的,连浪漫蝴蝶都不愿意给予她笔下的女性)形成比拟关系。在形式上就形成了女性=动物(畜牲),低于男性的隐喻意蕴。叙述者在多个人物形象的动物比拟中,使这些人物相互印证着、彼此暗示着女人们的悲惨命运。

在第三章《老马走进屠场》里,王婆将老马赶往屠宰场的一幕,写尽了人对牲畜——马深厚的感情。第三章一开始就将老马与老人并置在一起:

深秋带来的黄叶,赶走了夏季的蝴蝶。一张叶子落到了王婆的头上,叶子是安静地伏贴在那里。王婆驱着她的老马,头上顶着飘落的黄叶;老马,老人,配着一张老的叶子,他们走在进城的大道。

王婆一路上走着,心里想着可怜的老马,甚至幻想“屠刀要像穿过自己的背脊”,在屠宰场院内,“满院在蒸发腥气,在这腥味的人间,王婆快要变作一块铅了!沉重而没有感觉了!”

小说不仅写出了王婆对老马的深厚感情,而且老马的命运和老人的命运之间还形成了一种有机的对应关系:老马的命运就是王婆的命运。在这一章的结尾,当地主让人将买马的钱拿走了

后,叙述者非常明确地将老马与王婆进行了形式上的连接:“王婆半日的痛苦没有代价了!王婆一生的痛苦也是没有代价。”点明了像王婆一样的女性的生命也如同—匹老马一样没有任何价值。

作者将王婆对老马的爱和同情进行有机连接,实际上意在写出女性与命运抗争的徒然,辛劳一生却没有任何收获。这一章的内容,写出了王婆对老马无法舍弃的爱。这种痛苦也可以看成是在农家主人与牲畜之间深厚感情的表现。陈思和就认为这“完全就是一个农人对牲畜的天然的情感,这种情感丝毫不矫情”,老马这样的牲畜就是“农人们的伴侣”“家庭成员”,他们“用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的感情去对待它们”<sup>[9]</sup>。但结合小说第一章内容看,这种爱实际上却具有双重意蕴,一重是农人对牲畜的爱,另一重则是女性对老马命运的感同身受。在叙述声音里充盈着女性对自己悲剧命运的一种认识和痛惜。

马静静地停在那里,连尾巴也不甩摆一下。也不去用嘴触一触石碾;就连眼睛它也不远看一下,同时,它也不怕什么工做,工作来的时候,它就安心去开始;一些绳索束上身时,它就跟住了主人的鞭子。……主人打了它,用鞭子,或是用别的什么,但是它并不暴跳,因为一切过去的年代规定了它。

小说第三章与第一章已经形成一种对照,年老无用的女性正像老马一样,最后只有走向屠宰场的命运。这种悲剧性命运的根源,正如萧红所说,是“一切过去的年代规定了它”。这种思想不可能是老马的思想,实际是作者将女性命运与老马命运形成连接之后的一种思想意识的表现。因此这种“规定”就不单单是马主人与马之间关系的规定,还暗含了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份的规定,揭示了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作者对老马悲惨遭遇的总结实际上也是对女性悲剧命运的一种隐喻性的总结。

小说在一种看似松散的结构中,在不同的部分,将不同的女性人物与动物进行比拟,反复言说着女性命运的悲惨,在结构上形成一种隐喻的

强化。“萧红的文本结构在其乡土想象中和女性身体紧密结合,让她找到可供模拟、互写和反思的聚焦点。”<sup>[5]</sup>作者对女性命运的同情得到了一步步强化,由此也完成了作者在文本上的叙述权威,让读者不知不觉中受到影响,并接受了作者的观点。

#### 四、革命叙述与女性意识

在小说中,萧红虽然着力描写女性身体与乡土的同构性,虽然将自己对女性的同情通过动物的形象比拟得以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的小说只有这些内容。叙述者也并未完全采用这种曲折隐喻的方式来表达观点,或者尽量隐藏来自叙述者的价值判断。这些与之前思想意识有明显偏差的、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以及叙述者对人物、事件的评述,依然作为小说的一部分重要内容而得以呈现。如:

(1)在乡村,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她们。

(2)大肚子的女人,仍胀着肚皮,带着满身冷水无言地坐在那里。她几乎一动不敢动,她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

(3)赵三只知道自己是中国。无论别人对他讲解多少遍,他总不能明白他在中国人中是站在怎样的阶级。虽然这样,老赵三也是非常进步的,他可以代表整个的村人在进步着,那就是他从前不晓得什么叫国家,从前也许忘掉了自己是哪国的国民!

这些叙述无论是对父权制或男权中心主义的批判,还是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判断,都明显夹杂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些思考。但这些叙述和判断常常采用单独一段的方式,与小说的内容、故事结构的关系结合并不紧密,如果将其去掉也不会对小说的结构和意蕴表达造成大的损害。结合小说前后文,这样的叙述和判断,明显不够真实和自然。叙述者并没有从人物角度,从实际情况出发来总结人物思想。这样的叙述话语是被生生嵌入到关于乡村生活的叙述中的,其评述的内容与小说主题处于一种相对割裂的

状态。这也说明这些来自左翼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与小说内容是格格不入的。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萧红对女性题材的小说都能秉持一种来自女性的独特眼光。在她的文本中,我们无法将革命、民族命运与女性命运形成一种彼此关联的整体,而是各行其道,甚至革命、民族、命运,成为了女性命运抒写过于宽大的华丽外衣。在这件外衣的庇护之下,女性经验的特殊性,女性多舛的历史命运,才能在当时以民族、革命等左翼文学的意识形态中堂而皇之地存在。这种意识形态本身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男性中心论色彩。

文中对金枝命运的描写就深刻地体现了这种思想。尽管金枝也如其他女性一样命途坎坷,但作品并未给她安排一个像其他女人那样悄悄死去的结局。金枝在丈夫死后到都市去谋生,虽然逃脱了日本鬼子的奸淫,却未能逃出当地流氓的掌心,受着丈夫和流氓的双重凌辱。她忍饥受饿、受尽凌辱,仍然找不到活路。回到乡村后,她产生了当尼姑的念头。于是她来到尼姑庵,准备削发为尼。但是人去庵空,她连最后这一点希望都破灭了。世界之大,却没有她的容身之地。金枝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无法想象金枝后来的生活,小说并没有给出答案。

金枝在乡村和城市都遭受到男性的迫害,在乡村,丈夫摔死了自己的孩子;而在城市,金枝又受到了其他中国男性的侮辱。对此金枝是这样说的:“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鬼子。”随后又加上了一句:“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从金枝的角度讲,她并没有真正亲历日本人的迫害,应该说在她的思想中,男性才是带给她悲剧命运的唯一原因。最后一句“恨中国人”,是非常突兀的。从故事内容看,金枝未曾经历过鲁迅似的对“看客”的愤怒,从文化较低农村妇女的人物身份设定看,也很难具备这样的觉悟和水平。但这样的表述,站在左联革命文艺的视角来理解,很自然就可以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鲁迅式的人性思考取得联系。但结合金枝故事内容而言,从女性受辱的现实来看,这个“中国人”则指向了中国男性。从叙述话语进行分析,

可以看出那些堂而皇之的民族革命语汇中,女性身上重重枷锁的勒痕。从叙述的语言上说,对于尚未具有国家民族意识的农村女性而言,显然是无法将自己的思想上升到鲁迅式的人性思考的高度的。这一思考与作者的思想形成了某种明显的关联。对照上文分析,对生活在底层的底层,过着动物般生活的农村妇女而言,“中国人”指向的是中国的男性。因为在旧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女性还不能称之为“人”。叙述者也在金枝说完之后,下了自己的判断:“王婆的学识还不如金枝了”,这与其说是对金枝思想的肯定,不如说是对自己思想的肯定。可以说,这正是典型的女性文本的双重意蕴表达,萧红小说不经意地从女性命运出发来思考女性问题,已深深触碰到了女性生活的历史真实,这就远远超越了民族抗战和阶级斗争主题的樊篱。

萧红的这种叙述策略在她其他文本中也有所体现,在其1933年所写的《弃儿》中,因为生活所迫而准备放弃自己刚出生孩子的芹,在医院中与生下来的孩子隔绝了5天,而孩子在隔壁也哭了5天。芹听见自己孩子哭泣的时候,叙述者对芹的内心是这样展现的:

孩子咳嗽的声音,把芹伏在壁上的脸移动了,她跳上床去,她扯着自己的头发,用拳头痛打自己的头盖。真是个自私的东西,成千成万的小孩在哭怎么就听不见呢?成千成万的小孩饿死了,怎么看不见呢?比小孩更有用的大人都饿死了,自己也快饿死了,这都看不见,真是个自私的东西。

小说对一个失去了孩子年轻女性内心的描写,对自己“真是个自私的东西”的自责,将自己孩子哭与成千上万孩子哭之间所进行的联系,显然是十分牵强的。能够作出这种反省的女性,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落后中国,显然不是一般的女性能够形成的思想,而更像一位革命者的思想。但在小说中,读者并没有读到任何有关芹革命的内容,所以这一叙述与小说主题显然也是割裂的。

这种关于革命的叙述,总体而言与萧红小说

所表达的思想或者说人物的自然发展而言是不协调的。但却能够有效地获得以“左联”为首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实际上萧红叙事文本虽然付出了“不够自然”的代价,却也的确使萧红顺利跻身文坛,并且得到包括鲁迅在内的左翼文学作家的认同。

萧红小说中对民族、革命等主题的了解与体会显然是不足的,这也是她的作品被诟病的地方。《生死场》前后两部分的写作是分离的,从“生死”之“场”到农民的反抗主题转换过于仓促,有评论家也认为小说前后两部分的矛盾对她的小说结构造成了损害。胡风认为这部作品“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全篇显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sup>[10]</sup>。如果这个“中心”是前半部叙述声音所表现的女性的历史困境和体验的话,那么后半部分的叙述声音则突兀地表现了农民抗战的主题,这的确是“组织力不够”,是前后矛盾的。作者在第一部分叙述声音中自由地发掘了女性的历史经验,让第二部分关于抗战主题的叙述声音成为了“女性生死之场”的合法外衣和保护伞。结合左翼文本意识形态的要求不难发现,在两部分看似矛盾的叙述声音中,在当时情况下,作者不得已而为之的聪明选择。在这种矛盾的叙述声音中,既顺利地在本中发出作者对男权中心主义的反抗之声,同时也使之逃离了左翼文学的苛责。

萧红的这种写作方式与其他作家笔下的妇女题材小说是大为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合时宜的。她带有深邃历史感的女性感悟,已经明显偏离了左翼文学的主流话语。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于革命所需要的女性题材的小说,往往按照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要求,从政治和阶级的角度,来探讨女性问题,呈现处于阶级底层的农村女性的悲剧。同时,基本都要给予女性一个光明而简单的结局,认为女性唯有跟着共产党和无产阶级走,才能获得解放。

萧红的文本写作的独特性就在于:她将女性文本的双重性贯穿到底,将这种对女性忧伤和耻辱的抒写,植入到民族命运主流话语的书写之中。实际上构成了对左联主流文学话语的一种

解构力量,同时也唤起了人类共同的苦难而疼痛的历史记忆。茅盾在《呼兰河传》中看到了女性精神和肉体被双重异化的现实,但是也对其提出了批评:“作者所写的人物都缺乏积极性……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sup>[11]</sup>。毫无疑问,用反帝反封建标准看《生死场》,萧红的确呈现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农民特别是农村妇女的悲惨命运,另一方面是封建文化和日本侵华战争的罪恶以及农民的反抗。但不同角度的读者却对作品形成了不同的认识,站在革命者的角度,该文本中有大量的革命话语,真切地揭示了妇女的悲惨命运,是极为符合革命文学潮流的文本。作为女性读者,或者从故事出发的一般读者,却很容易在作品中读出女性对男权社会的反抗,读到女性不能掌控自身命运的痛苦与悲哀。

### 五、女性叙事文本的双重性

萧红的《生死场》形成了一种双重性的文本,这不仅源于小说本身艺术性的要求,也源于特定历史时期,身为女性作家的一种叙述策略上的灵活调整。萧红靠近左翼文化,一方面想要自己的小说在革命群体中得到认可,另一方面,又企图对根深蒂固的小说传统和社会权威提出挑战,强调呈现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悲剧性命运。萧红的写作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不一样的气息:“这个作品不成熟,但是它有原始的生气,有整个生命在跳动,有对残酷的生活现实毫不回避的生命体验。”<sup>[9]</sup>“当富于女性生命感受的爱被女作家作为解决社会问题与人生矛盾的一种理想投向广阔的社会空间时,被明确指认为无效、无力;可是,当女性之爱作为温柔的抚慰点缀在家庭式场景中时,就被认为适当且令人愉快。”<sup>[12]</sup>女性作者在言说自我与获得公众权威之间,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这常常会给女性作者带来烦恼,也促使女性作家们思考如何才能协调二者的关系,使自己的小说既能言说自我,又能获得公众的认可。伍尔芙曾这样认为:过去妇女所写的小说,虽然像画眉鸟美妙的歌声一样,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但同时也像画眉鸟一样,唱着单调重复的曲调。在她看来,女性写作所遇到的这一

难题,其解决之道必须依靠女性自己的思考,女性要意识到女性写作的优势,并避免其缺点。要将这种优势转化为最终的胜利,不在具体的事件中沉湎,也不要为了女性对细节的敏锐发现而沾沾自喜<sup>[13]</sup>。

女性作家必须在男性所建立的文学传统中进行写作,必须服从这一话语秩序,另外,由于女性与男性身份的差异,由于现实中被排挤的地位,女性一旦开始进行自我表述,就必然带有一种明显的差异性,乃至反抗性。兰瑟在论述女性叙述声音谋求权威的过程中,曾对其进行了辩证性的解释。她认为女性作家对男权社会的权威持有一种“双重态度”:一方面,为了获取话语权威,包括获得出版的机会,最终赢得尊重和赞同,她必须屈服于既有的文学传统和权威;另一方面,每一位作家都想通过作品影响读者,“都想在一定范围内对那些被争取过来的读者群体产生权威,尽管这种想法也许是具有强烈的反作者权威倾向的”<sup>[4] (P7)</sup>。

这种双重性的态度,促使女性作家的创作活动具有不同于男性作家的特点。现代女作家们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所发出的女性之声,与新文学革命、社会改革直至民主革命形成一个共同体,其指向都是要突破封建传统的樊篱,树立一种社会新女性的形象。但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她们又不断挑战主流文化的“性别”言说,去深入表达女性真实的身心体会,表现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在新文化运动和革命阵营内部所经历的真实处境。这种写作方式深化了女作家的自我认知和作品的审美建构,不断消解和冲击男性中心文化及传统美学概念,促使人们对固有文化秩序进行反思和审视,也开启了重建性别文化的文学历史进程。

萧红在诗意或形象化景物描写和人物形象化的叙述声音中,将自己对人性的思考与景物描写进行有机融合,使作品获得了一种超越时空的美学意义。在她的其他作品中,也贯彻这种诗意的抒写。生命就像肃杀的秋天一样苍白悲凉,充满了人生无常和物是人非。女性眼中的故乡在作者异常冷静的笔调中得以艺术性的呈现。萧红最后选择离开

主流话语,其目的或许除了对爱情的依托,还有对自由书写的追求,如此,她才能更为自由地书写来自内心那份女性的忧伤和生命的体悟。“萧红最初对左翼文学的情感投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时代所赋予的现实功利目的,结果是这种现实功利为萧红早期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文学视野和历史前景,但最终却并没有把萧红的作品引向深入。在萧红经历了更为复杂的情感经历和生活经历之后更加深了她对自己身为女性的不幸和悲哀,因此,她把文学表现的重点转向了女性自身,转向了自己内心更加深刻更加隐蔽的情感体验世界。”<sup>[14]</sup>即使在遍尝人生苦果之后,萧红在生命之火行将熄灭之际,对生命价值的领悟和女性命运的深刻认识,也促使其在对艺术和女性自身的命运进行了反思:“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个女人”,“这样死,我不甘心……”<sup>[15]</sup>

萧红在生活现实磨难中感受到女性的命运早已由“历史”所规定并写出,对于作家的自我已被深深“封锁于历史凝滞不动的深层”,她希望能够写出中国古老的历史记忆里被忽视和遗漏的部分,那些男性作家无暇无力写出的女性真实历史<sup>[16]</sup>。这部分关于生关于死的记忆,不仅是女性的历史,也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正因为她的文本关注那些尚未被公诸于世的,同时又是非常重要的史实,真真正正地刺激了中国人的神经和眼睛,因此也产生了一种震撼人心的作用。

对于萧红而言,在她的小说文本叙述形式的叙述声音中,就表现了双重的心理特征,对以男性为主的主流革命意识形态形成了从归附到解构的过程。一方面她接受了左翼新文化,认为女性必须汇聚到时代、民族革命的洪流中去,所以许多革命话语都在叙述话语中出现,以此谋求话语权威。但另一方面,身为女性,而且是命运坎坷的女性,女性的各种难以启齿的暗藏在历史岁月中的命运与悲痛,依然让她无法释怀。她试图超越这一话语,揭示了这一话语对女性命运的虚妄性。所以革命话语就变成了覆盖在这些女性幽暗伤痛之海上的浮在海面的泡沫,绚烂无比却又单薄脆弱。轻风乍起,就烈烈地露出了那些暗红色的哀伤。她将女性写作拓展到对人类共



同命运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关注上,这必然提升了女性作家作品对社会的影响力,使作品具有了超越时代的恒久魅力,这不仅在文本中建立了“虚构的权威”,也建立了女性作者对真实读者的叙述权威。

#### 注释:

- ① 本文中萧红作品引文皆出自《中国现代小说精品:萧红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 参考文献:

- [1] 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2.
- [2] [英]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82.
- [3] 申丹.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评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1):136-145.
- [4] [美]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5] 林幸谦.萧红小说女体符号与乡土叙述——《呼兰河传》和《生死场》的性别论述[J].南开学报(哲

- 学社会科学版),2004,(2):100-124.
- [6] 骆宾基.萧红小传[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73-74.
- [7] 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223.
- [8] 鲁迅.《生死场》序言[A].萧红.生死场[M].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1.
- [9] 杨义.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M].上海:三联书店,2007.181.
- [10] 胡风.《生死场》读后记[A].萧红.萧红作品精粹[C].沈阳:沈阳出版社,1996.122.
- [11] 茅盾.呼兰河传·序[A].萧红.呼兰河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11.
- [12] 乔以钢,刘堃.试析《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的性别策略[J].南开学报,2005,(2):21-27.
- [13]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M].瞿世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58.
- [14] 翟瑞青.童年经验和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63.
- [15] 葛浩文.萧红传[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151-152.
- [16]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90.

## Textual Dualities of Xiao Hong's *Sheng Si Chang*

SHU Linghong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4, China)

**Abstract:** Narrative text of woman writers shows contradictory dual attributes. As far as woman writers are concerned,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y are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times, awakened and started their revolt, which is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narrative duality in Chinese female writing. As a Chinese woman writer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Xiao Hong established the female self-consciousness earlier, whose *Sheng Si Chang* shows the textual dualities prominently. In this text, under the surface of revolutionary narrative, the suffering of women's lives is foregrounded. *Sheng Si Chang* presents the symbolism between women and the countryside, and similarity between women and animals. On the one hand, Xiao Hong clung to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seeking discourse authority; on the other hand, beyond this discourse, she reveals delusive nature of women destiny under such discourse.

**Key words:** Xiao Hong; *Sheng Si Chang*; woman; narrative texts; duality

(责任编辑 赵莉萍)